

天皇制民主的誕生

● 楊際開



道爾 (John W. Dower) 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北京：三聯書店，2008)。

道爾 (John W. Dower) 的《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引用只註頁碼) 漢譯本全書七十萬字，由「勝利者與

失敗者」、「超越絕望」、「革命」、「民主」、「罪行」、「重建」六部共十七章組成，並利用當時的照片與漫畫，重現了日本從戰敗到重建的歷史過程。這部在1999年出版的大作譯筆細膩流暢，讓人讀起來津津有味，獲得視覺與史識的雙重收穫，對釐清東亞的近代進程提供了一個承前啟後的展望台。本書雖然為英語讀者而寫，但也有讓中國讀者感興趣的地方，如美國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政策決定的過程、天皇的角色定位，以及戰後日本的重建與東亞的關係等。

這是一部研究文明觸變 (acculturation) 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講得很清楚：「儘管日本戰後最終以一個保守國家的面貌出現，然而和平與民主的理念已經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為假借的意識形態或強加的幻象，而是作為一種生命的體驗與牢牢掌握的契機。」「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兩種文化交匯的歷史時刻，比這更強烈、更不可預知、更曖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興奮了。」(〈序言〉，頁5)

《擁抱戰敗》一書雖然是為英語讀者而寫，但也有讓中國讀者感興趣的地方，如美國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政策決定的過程、天皇的角色定位，以及戰後日本的重建與東亞的關係等。

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到二戰結束才出現轉機，美國對日本改革方案被羅斯福新政的理想主義所浸染，說明日本的重建也是危機後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復蘇與重建的一部分。

作為美國的日本史專家，道爾寫道：

戰勝者引入的改革，對於日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它們反映出被美國的新政姿態、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改良主義與權利法案的理想主義所嚴重侵染的構想，而這種傾向在美國本土正處於被否定或者受忽視的過程之中。此種構想從未被引入美國在亞洲的其他佔領區域，譬如南朝鮮、日本本土南端的沖繩以及琉球群島。在那些地方，嚴酷的戰略考慮佔了上風。（〈序言〉，頁8）

這段話點出了美國以一種全球戰略的文化方式來處理戰後日本的重建。在某種意義上，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出現轉機，美國對日本改革方案被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新政 (New Deal) 的理想主義所浸染，說明日本的重建也是危機後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復蘇與重建的一部分。

「和平」與「民主」是兩種不同文化交匯時的共同主題，它們如何作為生命的體驗進入到日本社會中去正是本書的主題。在美國佔領軍對日本進行改造計劃的背後，有一種日益增長的緊迫感：「日本不僅應當以『民主化』來阻止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同時還要擺脫共產主義影響上升的態勢。」（頁45）為此，佔領軍要從事的是：「重建一個戰敗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並逐步改變其民眾的思維方式。」（頁47）如何才能完成這一社會工程？這當出自佔領軍與戰敗國雙方

的需要。然而，作者指出：「對美國的改革者們而言，這場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興奮快感，來自於使一個東方的敵人改變本性，將其轉變成一個至少近似於他們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國家。」（頁49）書中處處可以看到作者對佔領軍出發點的批判性言辭。

由美國主導的改革從政教分離開始，在兩年內，擴展到民法和刑法改革、廢除使男尊女卑合法化的家族制度、賦予婦女參政權、員警分權化、制訂保障工作條件的進步法令、改善教育體制和課程設置、革新選舉制度，以及促進針對中央政權的地方自治。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動日本政府出台新憲法。但是，以戰勝與戰敗形式進行的兩種文化的接觸，最初是通過一種不平等的性關係展開的。在書中，登載了一張孩子模仿美國大兵和日本妓女的遊戲照片，作者寫道：「當孩子們長大一些，遊戲漸漸變成了實踐。新聞界留意到，遭取締的妓女中包括年僅十四歲的年輕女孩，而學校裏的男生們與孤兒和流浪兒一樣，很快就學會了當皮條客掙零花錢。」（頁81）在美國向日本推行民主革命以前，日本社會已經在佔領下出現了性道德的扭曲。

美國是如何在戰後日本進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這是本書的着眼點之一。服務於佔領軍的美國作戰新聞處的文化人類學家克拉孔 (Clyde Kluckhohn) 和萊頓 (Alexander H. Leighton) 認為，「作為日本至高無上權威的天皇，根本上就是個空虛的容器而已，就像天皇可以作為極端民族主義的化身被

供奉一樣，他也可以變身為某種帝制民主的象徵被迫隨」(頁192)。這成了佔領軍利用天皇推進民主改革的依據。對日本戰後重建的設想是從東北亞的時局出發的，因此，並非是研究日本的學者，而是研究中國的學者的識見受到了重視，如曾經擔任過蔣介石美國顧問、哈佛近代中國研究開拓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老師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認為，「戰後亞洲『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日本徹底的民主化，連同全亞洲領域的經濟實力最大化。不然的話，日本遲早會重蹈剝削掠奪式的帝國主義政策」(頁194)。這意味着美國對戰後日本重建的着眼點在於政治民主上。

在佔領軍干預下日本制訂的《新教育方針》指出，「明治時期以來的近代化，注重西方文明的物質方面，但是忽略了其背後的基本精神」(頁221)。這其實是對近代日本奉行的魏源「以夷制夷」哲學的糾正。筆者認為，明朝的「倭寇」、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明末抗清志士乞師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入侵亞洲，是日本在回應全球化挑戰中逐漸升級的過程。倒幕運動的衝擊來自鴉片戰爭，但是重建日本的模式則來自魏源在《聖武記》中介紹的滿人在東北統合部落的經驗。因此，日本長州藩的倒幕志士吉田松陰有入侵東北亞的想法，這種想法與「逐鹿中原」的想法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其目的是要維護一個與中國王權對立的虛擬權威——天皇。這是對東亞文明整體安全的一種承擔意識，吉田是從魏源等晚清變法思想家對美國民主制的讚歎中獲得了

在日本推動倫理革命的暗示的。以後，日本在東北搞滿洲國的動機雖說是要建立「東亞王道」，而方法是建立近代國家式的「西方霸道」，恐怕教祖還是魏源。因此，戰後日本的重建其實也是對魏源哲學的否定，具有東亞文明的整體意義。

1945年4月，日本共產黨領袖野阪參三在延安提出：反對「國家制度」的天皇制，但是天皇作為宗教領袖的更為廣泛的問題，可俟真正的人民民主體制建立以後，交由民眾投票選舉解決。日本共產黨把天皇的權威排除在「真正的人民民主體制」的建設之外，是對傳統的誤讀，而作者又混淆了作為「國家制度」的天皇制與作為宗教意識的天皇。筆者認為，應該從儒家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理解作為虛擬權威的天皇，此時的天皇起到了法原—秩序重建的媒介作用。作者從日本共產黨提出「糧食先於憲法」的口號，認為「與其戰前的立場相一致，日本共產黨更加傾向於關注打倒『封建遺制』或『反動政府』，而不是對權利的創造和擴張」(頁245-46)。由此可知，美國在日本推行民主化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亞洲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的防洪堤，作為精神層面的天皇具有利用價值。

作為全書核心的第四部「民主」由六章組成，前三章講述了天皇制的重建過程，後三章講述了戰後民主憲法的制訂過程。對天皇戰爭責任的免責是從天皇制在維持秩序的功能上考量的，而這一考量又貫徹了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反共產主義的雙重目的。也就是說，美國為了貫徹他們的價值也需要利用天皇的

對天皇戰爭責任的免責，是從天皇制在維持秩序的功能上考量的，而這一考量又貫徹了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反共產主義的雙重目的，是全球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經驗。

在美國的考量中，推動亞洲的現代化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同時進行的，這個進程在1950年代初期開始轉變為冷戰體制，而到1970年代才開始對中國有所緩解。

既成權威，這已經是一種權利在新的文化前提之下的創造，也是全球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經驗。與這一經驗形成對照的是，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改革開放，也是利用既成權威來推行現代化，但民主本身是缺位的。顧準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淡化權威」是指從抗日戰爭的勝利中毛澤東獲得的政治權威，他在日記中認為中國將進入經濟建設的推論前提是田中角榮訪華以後中日關係得到改善，中國對周邊的環境已經沒有後顧之憂了（顧準：《顧準日記》，收入陳敏之、顧南九編：《顧準文存》，第三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時代課題從敵對走向和解，由戰爭所建立起來的權威也面臨意義的轉換。天皇制民主是東亞文明史上最高政治權威理性化的產物，是在與西方民主制相遇以後，通過自身的意義轉換達成的。這是東亞文明整體面對西方挑戰的經驗，可以說是一種文明觸變，因此，對東亞文明中的各國都具有典範意義。因為「道」作為一種秩序理念是泛東亞文明的。

該書的第五部「罪行」由「勝者的審判，敗者的審判」與「戰敗之後，如何告慰亡靈？」兩章組成。作者在〈序言〉中寫道：「1853年，一支四艘軍艦的不起眼的美國艦隊……抵達日本，強迫日本實行開放；1945年，一支龐大的、耀武揚威的美式『無敵艦隊』再次來臨，迫使日本關起大門。」（〈序言〉，頁1）這還是一種西方中心的日本觀。台灣大學徐興慶教授指出，吉田松陰的弟子長州藩武士高杉晉作通過1862年

千歲丸的上海行，發生了從攘夷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態度轉變（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2003〕，頁236-37）。加拿大約克大學的中日關係史家傅佛果也認為，1862年千歲丸的上海行是中日關係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Joshua A. Fogel, "A Decisive Turning Point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Senzaimaru Voyage to Shanghai of 1862", *Late Imperial China* 29, no. 1 [2008]:104-24）。長州藩的年輕武士在這次上海行中發現已經無法在條約體制下的中國找到適合自己的商業利益，於是，開始了倒幕運動。

從1862年開始的倒幕運動到1942年日本版圖擴張達到巔峰時期的八十年間，日本完成了作為西方的反抗者向亞洲的侵略者的角色轉變。如何定罪日本確實是一個難題，可以定罪日本的還是亞洲受害國的人民。但是日本入侵亞洲的目的是抵抗西方殖民者，問題出在「以暴易暴=以夷制夷」的行動原理上，而這畢竟還是西方的法與邏輯。以西方的法與邏輯來反抗西方是沒有出路的。這個教訓無論對日本還是對中國都同樣有效。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以要求西方式自由民主始，以受到西方制裁終只是最近的例子。其實，在清末民初，沈曾植、金蓉鏡、馬一浮就已經認識到師夷必為夷所制的道理，因此，他們主張通過更新傳統內部的人文資源來回應西方衝擊。

最後，日本的重建意味極權主義官僚政治的重建：「這種佔領時

代的官僚構造，草率地建立在敗戰前日本固有的戰時官僚制度之上，在1952年之後被日本人精明地延續下來，以守護他們新的資本主義。」（頁531）在美國的考量中，推動亞洲的現代化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同時進行的，這個進程在1950年代初期開始轉變為冷戰體制，而到1970年代才開始對中國有所緩解，於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權威政治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中心的「民主政治」發生了衝突。日本戰後形成的官僚體制與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官僚體制是一對目的相反而結構相同的孿生子。

作者基於戰後日本重建的經驗，在結語中寫道：「事實表明，一個國家不必繼承儒家文化，就能推行獨裁政治、權威崇拜、和合第一、輿論一致以及自我束縛。」（頁549）如今，東亞的權威主義官僚政治面臨全球經濟危機的挑戰，要克服這一危機就需要改革官僚政治，這需要東亞不同地域的人民利用各自地緣政治的優勢，攜起手來共同打造東亞道德共同體。關鍵之處是要重建儒家的政治倫理，而天皇制民主的遺產將在未來的東亞民主秩序願景下得到新的繼承與發揚。

回憶與沉思 ——情緒性體驗的反抗姿態

● 陳鄭雙



陳家琪：《三十年間有與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陳家琪先生2008年在《新京報》的專欄上，刊發了以「三十年間有與無」為題的系列文章，讀者反響強烈。後集結成《三十年間有與無》（以下簡稱《三十年》），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於2009年初出版發行。陳先生贈筆者一冊，筆者讀後寫信評論說，這本回憶錄實在是精彩。陳先生回信道：「謝謝你的讚賞，

陳家琪的《三十年間有與無》以多年日記為底本，配着許多珍貴照片，其內容主要是談論三十年間發生的家國大事，怎麼會是本哲學書呢？